海洋考古学: 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

吴春明　张　威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海洋人文研究在我国传统史学和考古学上长期缺失, 引发了对于环中国海海洋人文历史认识的偏差。奠基于水下探索的海洋考古学作为海洋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主要实践环节, 是过去半个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一个部分, 近 30 年来西学东渐并于最近 10 年传入中国。环中国海海洋考古实践主要体现在沉船考古领域, 不但包括一系列古海岸淤陆中的沉船考古发现, 近年来从渤海湾到南海之滨的水下考古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 国外海洋考古学者还在环中国海以外地区发现了不少近古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远东航路沉船, 所有这些实践工作对于研究我们的海洋先民认识与开发海洋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海洋文化; 海洋考古; 古代沉船
中图分类号: K875/8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35X (2003) 03-0039-07

一、绪论: 海洋人文研究在我国史学、考古学上的失落

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veski)曾经告诉我们,"文化"是人类在满足生物性要求的同时所创造的一个不同于自然环境的、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境, 即物质文化层面; 为使这个有形的文化"环境"得以维持、延续, 就同时创造了文化规格, 即无形的组织和制度, 构成文化的社会、精神层面。[1](P241) 从这个意义去理解, 海洋文化就是人们在海洋活动中所创造的凌驾于海洋自然环境之上的一个新的人文存在, 既包括船舶、港口、码头、栈桥、海洋贸易物品、海上移民等有形的海洋物质文化"环境", 还有约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体现海洋人文传统的习俗与族群心理倾向等无形的海洋社会、精神文化层面。

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大国, 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精辟地概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2] 在这个多元一体、复杂多样的内在结构中, 面向东南的海洋性文化与面向内地的陆地性文化的共存无疑是中国古代和现实人文关系中两个最基本的传统。但是, 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是长江、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的农耕文化, 从一路领先的史前文化到绵延不断的王朝文明, 中国古代的正统人文无疑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面向内地的陆地性文化。即便近年史学、考古学上大兴文明起源、发展多元的讨论, 但主要是局限于农耕文化与正统王朝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多元性、区域多样性的讨论。在我国的传统人文史学乃至考古学的实践中, 在强调陆地性农耕文化与以黄河、长江两河流域正统王朝的文明史研究为核心的传统史学上, 海洋人文被长期忽视。

海洋人文研究从来就不是学术王国中的宠儿, 但我国老一辈历史人文工作者中不乏先见者。林惠祥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东南沿海的早期古文化不同于华北, 并在 50 年代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东南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理论, 强调了东南沿海地区面向太平洋的海洋性文化与以华北内地文化系统的差异。[3] 近年, 杨国桢教授在分析我国历史人文学研究的现状时也呼吁重视海洋人文研究, 他指出以往"海洋因素很少被置于观察的视野之内"、"历史学界对于海洋缺乏应有的热情", 即便已经出现了不少对于海洋社会人文的某些专题研究成果, 诸如海外交通史、海上贸易史、海外移民与华人研究等, 但还未见站在将"海洋性"作为与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陆地性"并列存在、相互补强之社会人文史学的高度, 将海洋社会人文史学、考古学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整体去建设、完善和发展。[4] 建立在直接的海洋活动基础上、包括一切面向海洋的东南海疆文化, 海洋人文研究是我国传统史学、考古学上长期失落的一个学术领域。我认为, 海洋考古学就是在这个视野下的考古学实践。

二、海洋考古学的学术范畴

由于对海洋考古学学术范畴在理论思维上的缺乏, 学界对海洋考古及其相关的航海考古、沉船考古乃至水下考古技术等领域相互关系的认识上也相当混乱。

在西方, 海洋考古学(Maritime/Marine Archaeology)被视为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分支学科。这就是说, 海洋考古关注的是海洋文化活

* 收稿日期: 2003-04-15
作者简介: 吴春明(1966-　), 男,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东南考古与海洋考古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动的一切遗存,而不是海底埋藏的人类文化遗存。对此,国外考古学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英国著名的海洋考古学者基思·麦克洛利(Keith. Muckelroy)在《海洋考古学》一书中指出:"海洋考古学就是人类在海上活动之物质文化遗存的科学研究,……她涉及海洋文化的所有方面,不仅仅意味者船舶等航海技术的遗存。"对作为海洋活动专门技术的船舶遗存的研究,只是海洋考古学的部分领域——航海考古学内容。"[5]圣·麦格雷(S. McGrail)在《海洋考古及民族志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说海洋考古的中心内容是"海洋文化"。[6]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馆长、东南亚与大洋洲海洋考古的开创者吉米·格林(Jeremy. Green)在《海洋考古:技术手册》这样一本强调海洋考古技术的专著中,虽主要针对海洋环境中遗存的海洋文化,但明确指出:"陆地上发现的古代沉船虽不出于海洋环境,也不属于水下考古,但却无疑属于航海或海洋考古学"。[7]所以,海洋考古学区别于其它考古学分支的特点在于其研究对象是海洋文化,而不是海洋埋藏文化。

作为考古学上研究海洋文化的分支学科之一,海洋考古首先要调查、发掘古代人类海洋文化的遗存部分,如古代船舶遗存及其所体现的造船、行船技术,港口与码头遗迹及其所体现的航海文化、技术,古外销物品、舶来品及其所体现的海上文化交流等。人们的海洋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航海活动外,还包括沿海居民的其它海上活动;由于海陆变迁等原因,人类的海洋文化遗存不仅发现于水下,还见于陆上。因此,海洋考古学的学术领域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大海扬帆是海洋文化活动的基本形态,也是面向海洋的沿海地区一切海洋文化活动存在的前提,因此航海考古是海洋考古的核心领域。航海考古(Nautical Archaeology),顾名思义就是人类历史上航海活动之遗存的调查与研究,因此航海考古不等于在海上考古。英国航海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迄今在国际海洋考古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就取名《航海考古与水下探索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简称 IJNA)。人类航海活动涉及的文化成果都属于航海考古的学术领域,其中主要的是船舶与海港,构成了航海考古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船舶考古(Boat Archaeology),就是调查、发掘、研究历史上各类船舶实物及相关的遗存,研究古代船舶形态、造船技术及船货物质的海洋考古分支。船舶考古的核心是沉船考古(Shipwreck &Wreck Archaeology),她的对象是考古发现的古代沉船实物,包括不同埋藏环境(水下、淤积陆地等)中的沉船。沉船考古不但要研究沉船船体本身的遗存,还通过对船货、用具等遗存的调查研究,探讨外销或舶来的物质文化史、贸易史、经济史、船上社会等有关的领域。此外,在中外考古发现中都有不少古代船模和船舶图像资料,她们不属于沉船考古,但对于复原研究古代船舶形态及造船技术发展史具有同样的意义。第二,海港考古的对象是古代港口、码头、锚地等泊船设施及相关遗迹,海港遗迹既存在于陆上,也见于水下。除了港口、码头等直接的泊船遗迹外,由于港口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配套设施及附属的文化产品,同样是海港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与直接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的船舶、海港遗迹等航海考古内容外,海洋考古还有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海洋性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应该说人类(特别是早期)的聚落行为主要是大陆性的,但沿海地区的海洋性的聚落活动很早就开始发育了,这些聚落活动的特点是沿海岸活动,靠海洋为生,如沿海地区史前考古中常见的贝丘、沙丘遗址应主要就是这种海洋性的聚落文化遗存。从理论上说,这些非直接海洋文化活动的海洋性聚落遗迹同样是海洋考古学的工作对象。

从研究古代人文遗产的考古学二分体系来说,海洋考古学是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而水下考古作为一个技术领域,是因文化遗存埋藏于水下这一特殊的环境而导致的一系列技术性层面,从严格的学术构成来说,还不好说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只是考古技术上相对于陆地考古的一系列特殊方面。从理论上讲,海洋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埋藏于陆上和水中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因此海洋考古学的实践既需要水下考古技术,又离不开陆上考古中的一般方法与技术。

但在实践上,海洋考古学与水下考古技术确实存在非常特殊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下考古已成为海洋考古的专门技术。这是因为:第一,海洋文化遗存主要埋藏在水下而不是陆上,特别是航海考古学上的沉船等主要遗存又大多埋藏在海底,因此水下考古专门技术对于海洋考古学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二,随着现代常规潜水技术的发明,水下考古技术也主要是应海洋考古、特别是海底沉船考古的需要而产生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水下考古专门技术也主要是被运用于海洋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发掘中,只是后来才被运用到埋藏于水下的大陆性文化遗迹的调查发掘中。从这个实践的层面来说,水下考古技术也基本上成为海洋考古学区别于其它考古学专题的一个特点。正如吉米·格林所说的:海洋考古虽不是水下考古,但讲到海洋考古技术时仍主要是针对海洋埋藏环境而产生的一系列水下技术问题,而且这些技术中的许多方面无疑还有效于陆上环境埋藏的海洋文化遗存、特别是淤陆中的古代沉船。[7]当然,我们又不因此而将水下考古技术完全等同于海洋考古学。因为,将水下考古技术等同于海洋人文研究取向的海洋考古学,仅仅强调水下考古工作而忽视海洋考古学的理论建设,水下考古将失去理论上的支柱而停留于水下工作的具体操作层面,最终偏离学术海洋人文发展史研究的主题。

三、海洋考古学在西方的发生与"西学东渐"

海洋考古学是一门产生、发展于西方的考古学分支学科,西方人从很早就开始对神秘的沉船文物产生兴趣,并一直试图对她们进行探索,在这些探索活动中萌发了朴素的"海洋考古"思想。但科学的海洋考古学产生的很晚,甚至当近代考古理论与方法在东、西方陆上考古中已经成熟发展的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考古学者难于深入到海洋文化遗存的最大宝库——水下,直接制约了海洋考古学发现与学术研究的发生。

(一)海洋考古学在欧洲的萌芽

西方世界试图探索海洋文化的历史可追述到遥远的上古,古希腊人借助简单的空气袋在地中海的海底采绵时就发现了不少沉船遗存,此后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打捞"沉船的活动,意大利东南内米湖(Lake Nemi)中传说的两艘罗马时代沉船的打捞是这类活动的重要代表。1446年,建筑师阿伯蒂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Leon Battista Alberti)试图对内米湖沉船进行打捞,由于潜水"设备"的简陋而失败了,但却证实了沉船的存在;此后的1535年德马基(F. Demarch)用简单的木制面罩潜到遗址上、1827年弗斯科尼(Annesio Fusconi)又使用木制潜水箱内装8个人,试图捞起沉船均未成功;直到本世纪初,墨索里尼花大力气才将内米湖水排干,使得"沉船"完整地显露出来,原来是两艘罗马皇帝的水上别墅。象内米湖这类沉船打捞还远不能算作海洋考古的范畴,因为这些活动都不具有考古学的目的与性质,历代对内米湖沉船的打捞都是处于好奇或是为了船内的金银财宝,只是"玩古"的古器物学行为从陆上向水下的延伸,但这一连续的事件代表了西方世界对水中埋藏沉船遗存的关注。

19世纪中叶以后,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核心、以探索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为宗旨的近代考古学方法在欧洲产生。西方考古学的先驱一开始就重视海洋文化的探索,也在不断地寻找一种调查研究海洋文化遗产、特别是埋藏在海底的大量沉船遗存的途径,1832年,对近代考古学产生有重大影响的现代地质学开创人利尔(Charles Lyell)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海底长期堆积起来的人类文化遗存比欧洲大陆上任何时代存在的遗存还要多;1925年,考古学雷纳克(Solomon Reinach)也叹到:"古代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坐落在地中海的海底……然而这家博物馆却还无法进入"。[8](P362)但海洋考古的早期实践只是西欧淤陆中的少量沉船。1863年,恩格哈特(C. Engelhart)在丹麦的斯列斯威格(Schleswig)沼泽地中发现了4世纪的"尼达姆(Nydam)"号沉船,并按陆地考古的方法进行了发掘和记录;在丹麦的奥斯塔特(Aoatad)和斯列斯威格的沼泽地中,还不断发现9世纪北欧海盗的维金船。由于潜水技术的限制,考古学者还是无法真正扣开通向海洋考古宝库的大门。

(二)轻潜的发明与水下考古技术的探索

20世纪初,头带硬盔的原始管供重潜技术的发明为各种水下探索、包括海洋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潜水技术在沉船等水下遗址的调查、打捞上得到初步的运用。1900年,在克里特岛与希腊大陆之间的安提基希拉(Antikithera)附近6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运载大理石和青铜雕像的中世纪沉船,希腊政府组织海军舰船进行打捞;1907年,伦敦文物协会雇佣了专业潜水员,对肯特郡赫尔纳湾的一处含有罗马陶器的沉船进行调查。潜水技术虽然运用于水下遗址的调查和打捞,但重潜技术并不适合包括水下考古在内的科学技术潜水活动,上述打捞仍并不是专业的考古学者在水下的工作。

1940-1950年代,法国海军组成了一个水下工作小组,由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负责,这个小组在1944年发明了自携式水下呼吸器(Selfish 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简称SCUBA),即常规轻潜,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一切水下科学探索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在这期间库斯托小组许多成员也被他们在潜水训练时常常耳濡目染的地中海海底沉船的无限魅力所吸引,他们的事业兴趣开始从军事潜水转向了水下沉船。1952年,库斯托领导首次调查并"发掘"了马赛附近大康格卢岛(Le Grand Conglou)海域的古希腊时期贸易沉船;该小组的另两名成员菲利普·泰莱芝(Philippe Tailliez)和弗里德里克·杜马斯(Frederic Dumas)也一直坚持在地中海海域寻找、"发掘"古代的沉船遗址,其中担任法国海军潜水学校校长的泰莱芝,组织"发掘"了法国德坦(Titan)暗礁的一处公元前一世纪的沉船;1959年,瑞典国王动用1200名潜水员将1628年的沉没的"瓦萨"号战舰打捞出水,这项工作被看成迄今为止最为宏伟壮观的一次沉船打捞。[9]但是,所有这些都还不是考古学者在水下的工作,即使它们的技术已经与后来海洋考古学上所运用的技术无太大的差别,也不能否定它们的非考古学性质。正如麦克洛利所指出的,由于这些专业潜水员在考古学知识上的缺乏,他们的"考古"工作"水平之低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5]在大康格卢岛沉船的发掘中,只有一堆库斯托感兴趣的文物,没有绘制出一张遗迹平面图,就连该遗址是一艘沉船还是两艘沉船,至今仍争论不休;泰莱芝对自己在德坦的发掘也不满意,他说:"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我明白出了好多差错……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得到一位考古学家的帮助,他一定会非常精细地记录下每件东西的位置,并通过亲自勘察而从最细微的痕迹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就是"瓦萨"的打捞也有问题,沉船出水前并没有作必要的测绘、记录,许多器物在出水后位置失落而无法复原。可见轻潜只是水下考古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轻潜技术发明的最初一、二十年里并没有真正为考古学家所运用。当然,这些工作为海洋考古学家亲临水下积累了丰富的水下工作经验。

(三)海洋考古学在地中海的诞生和西欧的发展

当专业潜水员在沉船遗址上进行了多年的破坏性"考古"工作之后,轻潜技术终于在1960年被考古学家首次用于海洋考古。这一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年轻的考古学教授乔治·巴斯(George Bass)带领他的学生,应邀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Cape Gelidonya)海域的古典时代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发掘,泰莱芝、杜马斯也参加了这项工作。[9]尽管当时的一些发掘技术现在看来已显原始,如将普通相机装在防水盆中充当水下相机等,但却是考古学家第一次亲自到水下作考古工作,开创性地在水下实践了考古学方法,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水下考古技术的诞生。

巴斯本人对古典时代考古感兴趣,他和他的考古队此后一直坚持在地中海从事海洋考古工作,为地中海青铜时代海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1961-1964年间,他们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Yassi Ada)第一遗址,1967-1969年间,他们又发掘了拜占庭时期的亚细阿达第二遗址,这次发掘中还发明或改进了许多新的技术和设备,如气袋装置(Airbag)、手扇发掘法(Hand Fanning)、立体摄影、水下电话间等。1967年,巴斯在主持了一个类似水下考古技术的培训班,来自10多个国家的40多位考古学者共同发掘了塞浦露斯的卡伦尼亚(Kyrenia)沉船遗址,参加这项发掘工作的考古学者后来都成了各自国家水下考古工作的带头人。[10]1973年,巴斯就职于德克萨斯A&M大学,在这里成立了航海考古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兼任该大学人类学系海洋考古专业主任,拥有全美唯一的海洋考古硕士点。1977年起,该研究所在土耳其的斯泽利曼(Serge Liman)地区的一艘11世纪的沉船进行发掘,该船装载玻璃制品,俗称"玻璃沉船"。在理论方面,巴斯于1966年出版了权威的《水下考古》一书。[11]1964年,英国成立了"航海考古学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会”,该学会编辑出版《国际航海考古与水下探索杂志(前述IJNA)》,这是一份面向全世界的高水平的航海和水下考古专业杂志。英国第一宗沉船考古是1965年对设得兰群岛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夫德(De Liefde, 1711)”号的调查;1967-1971年间,著名女水下考古学家玛格丽特·鲁勒(Margret Rule)主持发掘了都铎王朝的著名战舰“玛丽·露丝(Mary Rose)”号,是英国沉船考古学史上有计划调查发掘的成功一例,考古学者查尔斯王子亲自担任这一工作的基金会主席;还有在黑斯廷斯(Hastings)海域调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号,以及分别发现于布拉斯基特海域和拉卡达(Lacada)海域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圣玛利亚·罗莎(Santa Mariade la Rosa)”号、“希罗娜(Girona)”号等。1973年,苏格兰成立英国第一个海洋考古研究所,该所年轻的海洋考古学家基思·麦克洛利于1978年出版了优秀的《海洋考古学》一书。于此同时,西欧低地淤陆地区的沉船发掘也有不少收获。自从1939年发现了萨福克郡的萨顿·胡(Sutton Hoo)葬船以来,埋有不少金银珍宝的皇室葬船一直吸引着人们,1965-1967年英国考古学家发掘了其中的一艘6世纪的古船;1970年,格林威治国家海洋博物馆对肯特郡格拉芬尼沼泽地中的9世纪沉船作抢救性发掘。[5]

(四)海洋考古学的“西学东渐”

70年代后期以来,海洋考古学“西学东渐”,其中巴斯的学生英国考古学者吉米·格林(Jeremy Green)在澳洲、泰国、菲律宾海域以及我国东南沿海的工作最具影响。格林原是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参加过1967年巴斯主持的卡伦尼亚沉船发掘。1973年起,西澳大利亚海域发现了一系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格林出任西澳博物馆任海洋考古部主任,揭开了澳、亚地区海洋考古工作的序幕。格林首先发掘了1629年沉没的“巴达维亚”号、1656年沉没的“费居德·德雷克(Vergulde Draeck)”号、1727年沉没的“泽维克(Zeewijk)”号等东印度公司沉船。[12] 1979-1980年间,格林与泰国的考古学者联合发掘了泰国湾东岸科拉德(Ko Kradat)岛海域的一处明代沉船,1982-1985年,又联合调查发掘了泰国湾帕塔亚(Pattaya)海域的古代沉船遗址,以及科西昌(Kosichang)岛附近的两处有明代“万历”纪年瓷器的沉船。菲律宾是环中国海重要的海洋邻国,古代沉船遗存埋藏丰富。1985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授权著名的“环球第一”(World Wide First's)探险队(简称WWF)调查发掘了“皇家船长”(Royal Captian)暗沙海域的多处明清时期的沉船,但这次工作主要属于捞宝性质。以历史研究为目的的海洋考古工作兴起于1988年,格林领导的澳菲联合考古调查发掘了一处海洋沉船,1992年又开展对巴屯(Butuan)岛沉船与造船技术的民族考古学调查研究,标志着海洋考古技术传入了埋藏大量古代沉船的环中国海邻国海域,迄今这里的沉船考古工作已经达到20多处。[13]

我国沉船考古长期未能全面开展的主要原因是海洋考古技术的限制。文革时期,老一辈考古学家就了解到巴斯在地中海的沉船考古,加之西沙考古的重要性,曾试图发展海洋考古技术,夏鼐曾找当时的海军司令肖劲光协商西沙水下文物的调查,但最终未获成功。1981年,泉州海交馆邀请了福建省体委军体处和航海俱乐部的潜水员,在泉州湾的后渚港水域进行水下沉船“调查”,打捞到郑和船队的铁锚和民国时期的沉船等物,但收获不大。1983年,专事沉船捞宝的英国船长米歇尔·哈彻(Michael Hartcher)在中国南海海域的斯特霖威夫司令礁(Admiral Stelingwerf Reef)打捞起一艘明末清初的中国帆船,获得2.5万件中国外销瓷器。1985年,他又在这附近的吉德亚多夹暗礁(Reefs of Geldria's Droogte)海域将1752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森”(Geldermalsen)号商船打捞出来,并于次年4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拍卖中所获的15万件青花瓷器和125块金锭,总价值3700万荷兰盾(约合2000万美元)。1987年3月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附属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的筹备阶段。1989-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得莱德(Adelaide)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联合在青岛举办海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并在福建连江定海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发掘,格林就是这一培训计划的指导教练,我国第一批11名海洋考古学者因此获得“国际水下联合会(CMAS)”二星级潜水员证书,笔者也是其中一员。这个培训计划的完成标志着当代海洋考古方法传入我国,成为此后环中国海开展一系列古代沉船考古的重要基础。

此外,海洋考古技术也相继在日本海域得到了实践,发现了一批古代沉船遗址。1963年,日本考古学家聘请职业潜水员在北海道北部的网走湖作水下调查,但不能算水下考古技术的出现;1977年,考古学者开始在岛根和九州海域调查,标志着日本的水下考古开始;1975-1980年,日本对北海道江差港内的江户幕府海军战舰“开阳丸”号调查。京都教育大学的小林庆雄教授是日本水下考古的奠基人,著有《水中考古学》一书。著名学者还有京都埋藏文化财研究所顾问、京都艺术大学田边昭三教授,他于1985-1987年参加了叙利亚的沉船考古发掘。至于韩国新安沉船的工作,完全是职业潜水员的打捞活动,考古学者并没有深入水下。

四、环中国海沉船考古工作的进展

船舶是海洋文化的核心和载体,是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在其他领域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以我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域是世界海洋文明发育的重要区域,环中国海古代沉船的调查、发掘是我国乃至东亚、东南亚各国海洋考古工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就现状而言,环中国海沉船考古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这一地区海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史学术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沉船考古的历史与现状

西方成熟发展的海洋考古技术传入我国的80年代中期以前,在沿海地区淤积成陆的古海湾、古河道以及沿海地中发现了一批古代沉船遗存,成为环中国海洋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些工作有,1956年,山东梁山县宋金河故道发现一艘明代兵船;同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南京三汊河郑和造船故址上发现了一件古船的舵杆遗存;1958年,浙江温州发现4艘东晋时期的独木舟;同年,江苏武进战国淹城遗址的护城河中先后发现3艘独木舟。1960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在江苏扬州施桥的河道疏浚工程中发现一艘唐宋时期的木板船和独木舟。1972年,广东珠海三灶草堂湾浅水区发现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艘清代沉没的缝合船。1973 年, 福建连江鳌江南岸的水田中发现一艘西汉时期的独木舟; 同年, 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如皋县蒲西马港河故道发现唐代前后的木板船; 浙江宁波河义路唐代船厂遗址也发现一艘独木舟; 福建的考古工作者还在泉州后渚宋元故港湾内发现、发掘出一艘宋元时期的大型远洋木帆船。1974、1975 年, 广东及海南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组织了西沙文物普查, 在西沙群岛多处礁盘、沙滩上发现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铜钱币、铜器等船货及船货的凝结物, 揭开了西沙历代沉船遗址的线索; 同时, 东沙及南沙群岛也先后发现了类似的资料。1975 年, 广东省揭西县金河乡竹排头溪发现一艘古代独木舟; 同年, 江苏常州博物馆等在武进县万绥蒋家巷发现一艘大型汉代木船; 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在山东省平度县泽河东岸发现一艘隋代的双体木船; 河北省磁县文化馆也在该县南开河村修渠时发现 6 艘元代的平底木船。1976 年, 广东省湛江地区博物馆等在化州县石宁村鉴江东堤发现六艘东汉时期的独木舟; 同年, 珠海平沙前锋村发现 3 艘古代沉船, 并发掘其中一艘清代铁皮船。1978 年, 上海市博物馆在嘉定县杨湾的封滨河工程中发现一艘宋代平底船, 在疏浚南汇县大治河工程中又发现一艘宋代平底沙船; 同年, 浙江省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发掘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时, 发现一艘宋元时期的大型远洋木帆船; 天津市也在静海县元蒙口的淤陆中发现一艘宋代木船。1979 年, 上海浦东川沙县川扬河发现并发掘出一艘唐代木帆船。1982 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荣成县郭家村的海相沉积中发现一艘汉唐期间的独木舟; 同年, 福建泉州法石又发现一艘宋元时期的远洋木帆船。1984 年, 在山东省蓬莱县古登州港海域淤泥中先后发现三艘古代木质沉船, 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其中的一艘元代战船。[14]这些古代沉船使用了陆地考古的方法进行发掘, 它们的发现初步展示了中国古代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 并带动了造船史、航海技术史、海交史等相关专题学术研究的开展。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 随着西方海洋沉船考古专业技术的引入, 古代沉船的考古发现进入了新的时期, 古代沉船的发现由近海淤陆的偶然发现, 转向海底沉船的主动调查与发掘阶段。1988 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博物馆等合作调查广东吴川县吴阳镇沙角漩清代沉船遗址。1989 年, 与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联合调查了广东台山县以南的川山岛海域宋元沉船(即南海一号沉船)。1990 年, 中澳合作海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福建连江定海海域进行考古实习, 调查试掘了白礁一号宋元沉船, 并发现了白礁二号明末清初沉船以及尾仔屿等处的宋元沉船遗址; 同年, 调查发现了海南岛文昌县宝陵港海域的明末清初沉船遗址。1991- 1997 年, 来自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海洋考古专业人员连续对辽宁绥中大南埔三道岗海域的一艘金元时期沉船进行调查和大规模发掘。1995 年, 中澳两国海洋考古学者再次合作对福建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发掘。1996、1998 年, 与广东、海南的海洋考古学者合作先后对西沙水下文物的两次调查, 发现并试掘了多处唐宋、元明以来的沉船遗址。1999 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先后调查发现了宁波宋代沉船遗址, 以及广东新会崖山元初海战沉船遗址。2000 年,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考古队、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海洋考古学者对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 并进一步勘测白礁二号明代沉船。[15]这些水下考古工作说明, 在环中国海的我国一侧古代沉船的调查发现进入了新的阶段, 并标志我国的海洋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二) 环中国海诸邻国的古代沉船发现史

自三、四十年代以来, 在环中国海的邻国上曾先后获得一些海洋沉船的线索, 但海洋考古调查发掘主要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70 年代后期以来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海洋沉船考古工作先后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收获。

1976 年, 韩国全罗南道新安海域道德岛附近海底发现一艘满载瓷器的元代沉船, 韩国文化部文物局组织考古学者和海军潜水兵于 1976- 1983 年间对该沉船进行连续大规模的发掘, 打捞出水瓷器二万余件以及中国唐、宋、元各朝铜钱 26 吨。虽然在这处沉船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者没有亲临水下,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水下考古, 但其打捞出水的沉船文物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 1992 年在韩国西南部的珍岛海滩, 韩国光州木浦海洋文物保护所发现了一艘中国宋朝的独木舟。[16]

日本沿海地区很早就曾先后发现一些古代沉船的线索, 如 1931 年在福冈县博多湾南岸淤陆中发现了宋代的沉船遗物, 1940 年职业潜水员就在香川县香川郡直岛海域捞到宋元时期的瓷器等沉船遗物, 1951 年濑户内海的渔民也在友岛北面打捞到明代沉船上的贸易瓷器。1977 年, 考古学者还雇佣职业潜水员对香川县小豆郡内海町东部的水子岩海域进行水下调查, 发现有宋元时期沉船遗物。但比较正规的海洋考古田野工作是 1980、1981 年进行的长崎县北松浦郡的鹰岛海域海洋考古调查, 1994、1995 年再次调查发掘, 揭示了元军东渡日本的战船沉址。[17]

在"千岛之国"菲律宾, 1985 年,"环球第一"探险队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授权下调查并发掘了"皇家船长"暗沙海域的古代沉船, 不但发现了 1773 年沉没于该海域的东印度公司"皇家船长"号沉船(该岛礁因此得名), 还发现明代晚期沉没于此的二号沉船; 同年, 该考古队还在苏禄海的民都乐(Mindanao) 岛外打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格里芬(Griffin)"号沉船。1988 年,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与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合作, 调查发现了吕宋岛西博利瑙(Bolinao)、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 和民都乐岛北维德(Verde) 岛等海域的古代沉船。1991- 1994 年, 菲律宾的沉船考古集中在"圣迭戈"(San Diego) 号沉船上,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与环球第一探险队在艾夫(Elf) 公司的赞助下, 连续调查发掘了这艘 1600 年沉没于吕宋岛西南好运岛海域的满载中国陶瓷的西班牙战舰。1994 年,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调查发掘了巴拉望岛南面潘达南岛(Pandanan Isl) 海域的明代沉船。[18]

1976 年, 潜水游客在泰国湾东海岸的帕塔亚(Pattaya) 海域发现了包括一处元明前后的沉船。1977 年, 在科拉德岛(Ko Kradat) 海域又发现一艘明代沉船, 同年泰国与丹麦的一个联合考古队对这两个沉船地点进行了考察。1979- 1980 年间, 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与泰国国家美术部合作, 在吉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米 格林领导下对科拉德岛沉船连续进行两次发掘; 1982 年, 该考古队又对帕塔亚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同时又在该沉船北面的西昌岛(Ko Sichang)海域发现了两处明代的沉船遗址, 并于 1983- 1985 年间, 对科西昌一号沉船进行连续发掘。1992 年, 一个打捞公司再次在暹罗湾中部发现一艘 16 世纪早期的瓷器商船。[19]越南沿岸海域古代沉船的调查发掘开始于 90 年代。1990 年, 越南南部昆仑岛(Con Dao)海域发现 17 世纪的沉船瓷器, 随即越南国有打捞公司与新加坡考古学者合作对该沉船进行连续两个年度的发掘。1991 年, 又对发现于泰国湾东南岸柬越边境的富国(Pha Quoc)岛海域的一艘明初沉船进行发掘。[20]

印尼、马来海域也有丰富的古代沉船, 仅有文献可考的明清以来沉船就有不少。1983—1985 年, 荷兰捞宝商米歇尔·哈彻(Michael Hartcher)在我国南海南部靠近印尼一侧的斯特霖威夫司令礁(Admiral Stelingwerf Reef)海域先后打捞一艘明末沉船和一艘清初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森"(Geldermalsen)号沉船。1995 年以来, 马来西亚马六甲、吉隆坡等博物馆又相继在马属南中国海海域发现并发掘 4 艘明代前期至中期的海洋贸易商船。[21]

(三) 欧洲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发现史

70 年代以来, 在环中国海以外的海域连续发现了一批与海洋中国有关的古代沉船, 特别是航行于中外之间的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沉址。

1970 年, 在南非开普敦桌湾(Table Bay)海域发现一艘十八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奈约伦(Nieuw Rhoon)"号, 1971 年的发掘发现船上运载大量产自我国闽粤沿海的青花瓷器。[22]

1971 年,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的红海海域发现的十八世纪沉船中发现中国清代生产的瓷器, 1994 年埃及航海考古研究所又在该沉船附近的沙德万岛(Sadana Isl)海域发掘出具有类似内涵的沉船。[23]

1975 年发现、并于 1983- 1985 年发掘的法国西部贝里里(Belle-lle Isl)岛海域的 1746 年沉没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康迪王子"(Prince de Conty)号沉船上也有很多中国明清瓷器和茶叶。[24]

1976 年, 在南非西海岸的圣赫勒拿湾海域发掘的 1613 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威特利沃"(Witte Leeuw)号沉船上, 发现了大量产自明末中国东南的青花瓷器。同年, 又在东非海岸的法属巴萨斯- 印度礁(Bassas da India)海域发现了沉船文物, 以此为线索 1987 年调查发现多处古代沉船, 其中沉没于 1738 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苏塞克斯"(Sussex)号沉船上经发掘, 出水了许多清初雍正朝生产的中国瓷器。[25]

1976—1980 年, 在肯尼亚蒙巴萨(Mombasa)港发掘的 1697 年沉没的葡萄牙战舰"圣安东尼奥—唐纳(Santo Antonio de Tanna)"号上, 发现了许多中国产的青花瓷器。[26]

1984- 1997 年, 在瑞典哥德堡市的艾尔夫堡海域发掘出 1745 年沉没的"哥德堡"(Goteborg)号沉船, 这是一艘多次航行于中瑞之间的满载东方丝绸、陶瓷、茶叶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27]

1985 年, 在非洲西海岸加蓬共和国的洛佩斯角大西洋海域, 艾夫- 加蓬石油公司发现了 1609 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毛里求斯"(Mauritius)号商船, 1986 年发掘时也找到了许多明代青花瓷器。[28]

此外, 有 1595 年沉没于美国旧金山德累克湾的"金雌鹿"(Golden Hind)号、1615 年沉没于毛里求斯海岸的"班达"(Banda)号、1630 年沉没于南非海岸的西班牙"圣孔卡罗"(Sao Concalo)号、1641 年沉没于多米尼加的"理想"(Concepcion)号等沉船上也发现了中国船货瓷器。[29]

上述沉船考古收获与中国古代沉船考古与海洋人文学术研究密切相关, 相信随着我国海洋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 一个以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为主题的海洋社会经济与人文研究的热潮将会形成。

参考文献:

[1] 托夫卡. 外国民族学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2]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 1989, (4).

[3] 林惠祥. 福建武平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J]. 厦门大学学报, 1956, (4).

[4] 杨国祯. 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6, (2).

[5] Keith Muckelroy, Maritime Archaeology, New Studie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1978.

[6] S. (ed) McGrail, Aspects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1984.

[7] Jeremy Green, Maritime Archaeology- - A Technical Handbook, Academic Press, 1990.

[8] 格林·丹尼尔.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9] George F. Bass, Eighteen Mediterranean wrecks investigated between 1900 and 1968, Underwater Archaeology, a nascent discipline, Unesco Paris 1972; Keith Muckerlroy, Archaeology Underwater, An Attlas os the World's Submerged Sites, section Ⅱ- Mediterranean Wreck Sites and Classical Seafaring,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0; James P. Delgado editor, Encyclopedia of Underwater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George F. Bass, Eighteen Mediterranean wrecks investigated between 1900 and 1968, Underwater Archaeology, a nascent discipline, Unesco Paris 1972.

[11] George F. Bass, Archaeology Underwater, London & New York, 1966.

[12] James P. Delgado editor, Encyclopedia of Underwater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 Paul Clark, Eduardo Conese, Norman Nicolas, Jeremy Green, Philippines Archaeological site survey, February 1988. IJNA (1989) 18. 3; Jeremy Green and Vidya Intakosai, The Pattaya wreck site excavation, Thailand, An interim report. IJNA (1983) 12. 1: 3-13; 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 and S. Prishanchittara, The excavation of the Ko Kradat wrecksite Thailand (1979- 1980), Special Publication of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1981; 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 and V. Intakosi, The Kosichang one shipwreck excavation 1983- 1985, A progress report. IJNA (1986) 15. 2.

[14] 刘桂芳. 山东梁山县发现的明初兵船[J]. 文物, 1958, (2).

叶庙梅, 韩毓萱. 三汊河发现古代木船舵杆[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 (12).

戴开元. 中国古代的独木舟和木船的起源[J]. 船史研究, 1985, (1).

谢春祝. 淹城发现战国时代独木舟[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 (11).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 扬州施桥发现了古代木船[J]. 文物, 1961, (6).

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珠海市文物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卢茂村. 福建连江发掘西汉独木舟[J]. 文物, 1979, (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南京博物院. 如皋发现唐代木船[J]. 文物, 1974, (1).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A]. 东方博物(第一辑) [C]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7.
广东省博物馆等. 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J]. 文物, 1974, (10).
广东省博物馆等. 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J]. 文物, 1976, (9).
广东省博物馆等. 广东省西沙群岛北礁发现的古代陶瓷器[A]. 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 [C].
广东省博物馆等. 东沙群岛发现的古代铜钱[J]. 文物, 1976, (9).
陈仲玉. 东沙岛与南沙太平岛的考古学初步调查[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8 辑第二分册). 1997.
吴扬. 揭西县发现独木舟[J]. 汕头文物, 1979, (6).
武进县博物馆, 常州市博物馆. 江苏武进县出土汉代木船[J]. 考古, 1982, (4).
山东省博物馆, 平度县文化馆. 山东平度隋船清理简报[J]. 考古, 1979, (2).
磁县文化馆. 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木船发掘简报[J]. 考古, 1978, (6).
湛江地区博物馆, 化州文化馆. 广东省化县州石宁村发现六艘东汉独木舟[J]. 文物, 1979, (12).
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珠海市文物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上海博物馆. 嘉定封浜宋船发掘简报[J]. 文物, 1979, (12).
季曙行. 上海南汇县大治河古船发掘简报[J]. 上海博物馆集刊, 1987 年, (4).
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A].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 天津静海元蒙口宋船简报[J]. 文物, 1983, (7).
上海博物馆王正书. 川扬河古船发掘简报[J]. 文物, 1983, (7).
王永波. 胶东半岛上发现的古代独木舟[J]. 考古与文物, 1987, (5).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 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3, (2).
席龙飞, 贺顿. 蓬莱古战船及其复原研究[A]. 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C]. 大连: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1989.
[15] 杨林, 王军, 张威. 广东吴川县沉船调查工作简况[J]. 水下考古通讯, 1989 年, (3).
张威. 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k k 中日联合广东南海沉船调查侧记[J]. 水下考古通讯, 1990, (4).
张威. 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J]. 福建文博, 1997, (2).
中澳合作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定海调查发掘队. 中国福建连江定海 1990 年度调查、发掘报告[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2, (总第 18-19 期).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等. 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遗址调查简报[J]. 福建文博, 1997, (2).
张威. 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述要[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5, (总第 24 期).
张威. 海底七百年[J]. 福建文博, 1991, (2).
张威. 绥中三道岗沉船[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中澳联合定海水下考古队. 福建定海沉船遗址 1995 年度调查与发掘[A]. 东南考古研究(第二辑) [C].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16] 韩国文化部文物管理局. 新安海底遗物(鲜文) [M]. 汉城: 汉城三星文化印刷社, 1984.
Jeremy Green, The Shinan excavation, Korea: an interim report on the hull structure. IJNA (1983) 12. 4: 293-301.
袁晓春. 韩国珍岛发现中国宋朝独木舟[J]. 海交史研究, 1994, (1).
[17] 小林庆雄著, 王军译. 水下考古学入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长崎县鹰岛町教育委员会. 鹰岛海底遗迹III[A]. 鹰岛文化财调查报告书(第 2 集) [C]. 1996.
石原涉. 日本水下考古学现状与展望——以鹰岛海底遗迹为中心[J]. 福建文博, 1998, (1).
[18] Franck Goddio, Discovery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a 16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World Wide First, 1988; C. Dagget, E. Jay, F. Osada, The Griffin, An English East Indiaman Lost in the Philippines in 1761, IJNA (1990) 19. 1: 35-41; Paul Clark, Eduardo Conese, Norman Nicolas, Jeremy Green, Philippines Archaeological site survey, February 1988. IJNA (1989) 18. 3; Cynthia Ongpin Valdes, Allison I. Diem, Saga of the San Diego (AD1600), National Museum, Inc. Philippines, 1993; Alya B. Honasan, The Pandanan junk: the wreck of a fifteenth-century junk is found by chance in a pearl farm off Pandanan island; Eusebio Z. Dizon, Anatomy of a shipwreck: archaeology of the 15th-century pandanan shipwreck; Allison I. Diem, Relics of a lost Kingdom: ceramics from the Asian maritime trade. The pearl road, tales of treasure ships in the Philippines. Christophe Loviny, 1996.
[19] Jeremy Green and Vidya Intakosai, The Pattaya wreck site excavation, Thailand, An interim report. IJNA (1983) 12. 1: 3-13; 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 and S. Prishanchittara, The excavation of the Ko Kradat wrecksite Thailand (1979-1980), Special Publication of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1981; 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 and V. Intakosi, The Kosichang one shipwreck excavation 1983-1985, A progress report. IJNA (1986) 15. 2; 袁随善译. 在泰国暹罗湾中部发现的 16 世纪早期的东南亚沉船[J]. 船史研究, (第 11- 12 期).
[20]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IJNA (1992) 21. 3: 221-244; Warren Blake and Michael Flecker,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a South-East Asian Wreck, Phu Quoc Ialand, Vietnam. IJNA, (1994) 23. 2: 73-91.
[21] Antony Thorncroft, The Nanking Cargo, London, 1987; Michael Flecker, Magnetometer Survey of Malacca Reclamation site. IJNA (1996) 25. 2: 122-134; 袁随善译. 关于在南中国海发现的四艘明代沉船的消息披露[J]. 船史研究, (第 11- 12 期).
[22] Robert Allan Lightley, An 18th century Dutch East Indiaman, Found at Cape Town, 1971. IJNA (1976) 5. 4: 305-316.
[23] A. Raban, The Shipwreck off Sharm el-Sheikh, Archaeology (1971) 24. 2: 146-155; Cheryl Haldane, Sadana Island shipwreck, Egypt: Preliminary report. IJNA (1996) 25. 2: 83-94.
[24] M. L'Hour and F. Richez, An 18th century French East Indiaman: the Prince de Conty (1746). IJNA (1990) 19. 1: 75-79.
[25] C.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m (1613), Rilks Museum Amsterdam, 1982; G. Bousquet, M. L'hour and F. Richez, The discovery of an English East Indiaman at Bassas da India, a french atoll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Sussex (1738). IJNA (1990) 19. 1: 81-85.
[26] Robin C. M. Piercy,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preliminary report, 1977. IJNA (1977) 6. 4: 331-347;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second preliminary report, 1978. IJNA (1978) 7. 4: 301-319;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third preliminary report, 1979. IJNA (1979) 8. 4: 303-309;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forth preliminary report, 1980. IJNA (1981) 9. 2: 109-118.
[27] Berit Wastfelt, Bo Gyllenevard, Jorgen Weibull, Porcelain from the East Indiaman Gotheborg. Forlags AB Denmark 1991; 龚缨晏. 哥德堡号沉船与 18 世纪中西关系史研究[A]. 中西交流论集[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28] M. L'Hour and L. Long, The wreck of an 'experimental' ship of the 'Oost-Indische Companie: The Mauritius (1609). IJNA (1990) 19. 1: 63-73.
[29] T. Volker, Porcelia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1954; 冯先铭, 冯小琦.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瓷器[J]. 江西文物, 1990, (2).

责任编辑: 高 雪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